

小店流年

肖复兴

小区里，有家理发店。二十多年前，我住进小区，搬家一身泥猴，头发又脏又乱，看见这个理发店，走了进去。店不大，只是靠着围墙建起的一排屋子中的一间，有些拥挤，三把理发椅，几个凳子，一个带热水器的洗脸盆。墙上贴着几张美女的大头像，大概是从画报上剪下来的，映在镜子里面，自己对着自己搔首弄姿。

快过春节了，人不少，本想要走，一个小伙子笑脸相迎地叫住了我：“一会儿就完，您先坐在这儿吧！”南方话中夹杂着并不地道的儿话音。吸引我坐下来的，是他的长相。这是一个中等身材的小伙子，模样端正，五官清秀，完全配当一名演员。乍一看，有点像张国荣。

理发店里一共三个员工，两男一女，年龄都不大，张国荣——姑且就叫他张国荣——和一个染着一头黄毛的大个儿，是理发师。两人都穿着黑色的衬衣，帮着笔挺的领带。小姑娘撑得十七八岁，负责洗头染发和扫地。人长得娇小玲珑，白净净的脸上一对浅浅的小酒窝，储满笑意，很有些亲和力。我想如果把他们的包装包装，演一演电视剧，特别是那种青春偶像片，不见得比眼下那些当红的演员差。

果然等的时间不久，张国荣一边抖着手里的围裙，一边笑着叫我。我坐在理发椅上，他先问我：“您是第一次来吧？”我点点头，就算聊起来了。小伙子很健谈，我知道了，他们三个人都是从江西靠近南昌的农村来北京闯天下的。理发店老板是北京人，在马驹桥还有一家大得多的理发店，一般不上这边来，把这个小店交给他们打理。很显然，张国荣是负责这里的小头头，一问，真是。“什么头儿，就是按时给老板交钱。”张国荣有些羞涩地笑笑。

我问他：“快过年了，不回家吗？”他说：“我们要忙到年三十的夜里，大年初一上午走，都买好火车票了，京九线的，到我们家有一站。”“过年能给家里拿回多少钱？”“没多少，刨去吃住，最后也就剩下几千块钱。”黄毛大个儿和那个小姑娘在一边笑着说他：“他带的钱可比我们多，他家里用处多。”那笑中似乎别有含义，不怀好意。我忙问：“是不是有女朋友在家里，得专门带给她呀？”他的脸一下子红了：“哪儿有女朋友呀，您说现在谁愿意找我们剃头的呀？”等着剪发的一位大婶接过去话说：“那就在北京找一个！”他的脸红得更厉害了：“北京的姑娘眼睫毛长得比眉毛都高，谁看得上我呀。”大婶说：“可别这么说，出落得这么漂亮的一个小伙子，还愁没处找去？”黄毛大个儿回头说道：“那您捎带手帮我也找一个吧！”惹得大家都笑起来，笑声把小店烘托得暖融融的。

以后每次理发，我都到那儿去，发现去的大多是我一样的回头客。特别是小区里的大爷大婶们，更是常客，常常带着自己的洗发水和焗油膏，花费在小店里的钱很少，他们一样笑脸相迎，大爷大婶的叫得格外甜。

我已经知道，他们就住在小区一栋楼房的地下室里，住宿和饭钱，是由

老板支付，不过每天的饭钱三人一共只有10元钱，负责做饭的是那个小姑娘，我问她：“你们老板可真够抠的，这么点儿钱够吃的吗？”“没有办法呀，除去买来买面和买油的钱，剩下买菜的钱没多少了。夏天还好，菜便宜，还能够买点肉炒菜。我只能够每天下午人家菜摊快收摊的时候，买一些搓堆儿的便宜菜。”

每次洗头时，小姑娘都爱和我说话，有一次，对我说她来北京都快两年了，附近的公园玩过了，一直想去一趟长城，就是太远，店里的活又忙，没人能陪她去，再说去一趟也得花不少钱，一直没去成。

哪个小姑娘没有点儿愿望呢？那个小姑娘又不爱穿呢？有时看到她穿着新衣服，戴着手镯，扎着耳坠，便会夸她几句，问她是哪儿买的，怎么突然舍得花钱买这些东西了？她告诉我衣服是从女人街上买的，首饰是从潘家园旧货市场买的，都花不了太多钱。每次说到这里，张国荣都会说：“她呀，就会乱花钱！”她便反唇相讥：“又没花你的钱！”黄毛大个儿什么也不说，握着手里的剪刀或吹风机，总是在一边坏坏地笑。

日子长了，我发现并不只是我一个人，认为张国荣和小姑娘在悄悄地恋爱，起码有那么一点意思。男的女的长得不错，脾气性格不错，又每天在一起，你吹笛子我捏眼儿地配合得也不错，大家都觉得挺般配的。但是，大家都错了，不过是弄得太乱点鸳鸯谱。一次有位老太太一时高兴，问起正在给她染发的小姑娘，和张国荣是不是有那么一回事？惹恼了小姑娘：“谁老是这样嚼舌头，没影儿的事老往我身上瞎安！”一气之下甩下手里家伙什跑出了门。张国荣只好走过来替老太太继续染发，然后说道：“大妈，真没那么回事。”

倒是没有过多久，总有一个高高个子的姑娘，老坐在旁边空理发椅上，不着急理发，也不怎么讲话，就那么静静地一直坐在那里。我见过她好多次，挺好奇，有一次等着理发的人多，便搭讪问她做什么工作，她说是售货员，我又问她在哪儿上班，她说在中关村。好家伙，中关村，离着这里起码有二十多公里，那么远的道！她就那么一直等着，等到空闲的时候，让黄毛大个儿给她染发，也染成了一头黄毛，弯曲摇曳着。染好发，吹好风，黄毛大个儿穿上大衣，两人一起出了门。张国荣对我说：“看见了吗，人家才是真正搞对象呢！这一猛子扎出去，晚上见了，他的活儿都得我替他干喽！”小姑娘在一边抿着嘴笑，大家也笑。

我再去理发，没见到黄毛大个儿，一问才知道是速战速决结婚了，为了和爱人离着近便些，到老板马驹桥的那家店里去了。

小店里，来了一个小个儿的理发师，手艺不如大个儿好，人们都不大愿意让他理发，特别是那些老太太们，小个儿不在的时候，常常发牢骚，还是大个儿在的时候好。可想想也不能为了自己的头发，就棒打鸳鸯，让人家天各

一方啊。

小个儿知道大家对他的态度，不过，他不在意，整天乐呵呵的，爱一边干着活一边听耳机里的音乐，一边扭着屁股打着点；要不就是爱和小姑娘逗逗闷子，逗得小姑娘哈哈大笑。有时碰见两个喝多了酒理完发不给钱夺门就走的主儿，一般都是小个儿紧跟着跑出去，拽着他们的胳膊要钱。有一次，钱拿到了手，鼻子被人打出了血，他仍然扭着屁股踩着点儿跑了回来。不爱让他剪头的老太太，再轮到剪发时也不说什么，让他把围裙风似的抖开一个弧度，潇洒地在他的身上。

有一天，我去理发，看见黄毛大个儿回来了，那些兴奋的老太太们，纷纷地问他这问他那那的。黄毛大个儿新添了个儿子，专门跑回来告诉大家这个消息，也算是个念旧的人。老太太们连连夸他，然后不禁感慨着日子过得可真是不抗混呀，一晃黄毛大个儿结婚都一年过去了，自己的白头发染黑了又白了，不知多少次了。

有一年开春四月，我去理发，那时，张国荣在香港跳楼自杀没几天，我对张国荣开玩笑说：“张国荣自杀了，你怕不怕？”他笑着说：“我怕什么呀？我要是也能像他那样有钱又有名，死也值了。”我对他说：“你要是也能够去拍电影，没准能和他一样有名又有钱呢。”“您又逗我，我哪是那块材料！”“还真不是逗你，张国荣最开始还不是和你一样，也只是个平常的年轻人。”“人的命不一样呀，我的命就是理发，从来不赢蛤蟆梦想吃天鹅肉。”

小姑娘在旁边一边嗑着瓜子一边搭话：“照你这么讲，理发的都是癞蛤蟆了？最起码也得是青蛙吧？”逗得大家都笑了。

过了两年的春节后，理发店贴出了一张停业告示，他们盘下了旁边的一间屋子，准备把两间屋子打通，理发店要扩大地盘了，生意越来越兴旺。大家每天路过那里，看见张国荣、小个儿、小姑娘和一帮工人忙活着，都替他们高兴。理发店再开张，是七月份。这中间半年的时间，小区的人们尤其是那些老太太们不大适应，大家才忽然明白似的，小小的理发店已经是小区的一景一物一个念想，有它时没觉得多了点儿什么，没它时却觉得缺了点儿什么。所以，当理发店重新开张，来的人特别多。我去了几次，从玻璃窗户和玻璃门看进去，人影憧憧，只好赶在一清早理发店刚开门时去。这才发现真是鸟枪换炮，新扩的那一间新装了两把理发椅和两个蒸发器，还特别安装了一个躺式的洗头装置，一台崭新的29寸电视也悬挂在墙上，外间原来洗脸盆的地方放了一张写字桌，作为专门的收银台。

当然，最大的发现，是黄毛大个儿回来了，而张国荣、小个儿和小姑娘不在了。我向黄毛大个儿，他告诉我张国荣回老家结婚了。小姑娘也回老家了，她搞了个对象在那边。他自己呢，生了孩子后，在北京开销太大，爱人要上班，又要照顾孩子，太辛苦，实在是玩不转了，爱人带着孩子也回老家了。小个儿

去了哪儿，他不清楚。老板是个明白人，知道做理发生意，靠的就是人脸熟和人缘好，光是生蟒子重新打江山不行，就让他从马驹桥那边又回来，暂时支撑门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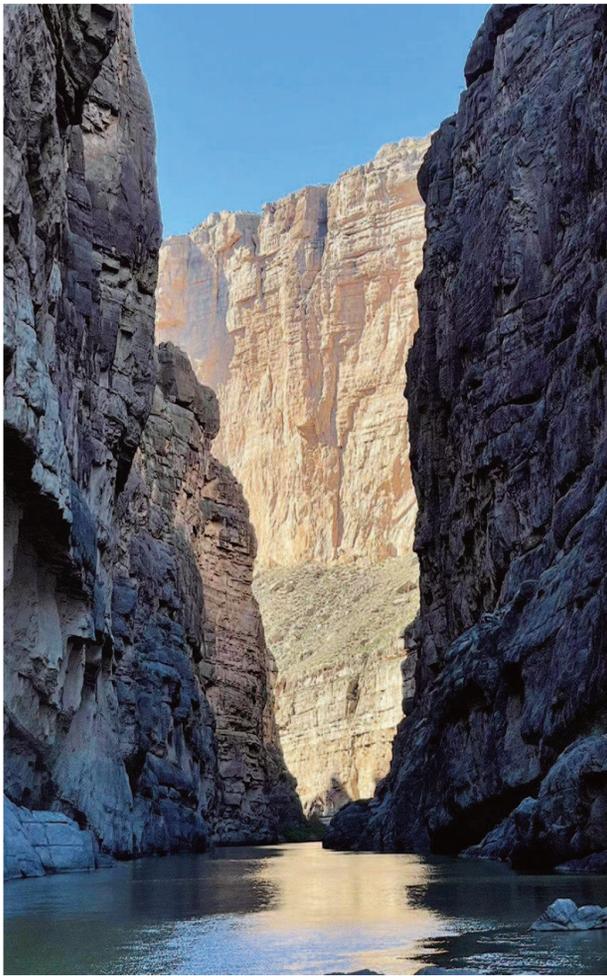
小店里原来的铁三角，只剩下大个儿了。新来的两个理发师，都是毛头小伙子。在人们的心目中，论手艺，张国荣第一，黄毛大个儿第二，都认为新来的两个小伙子不灵光，更没有张国荣那样爱说话，会说话，特别是长得又那样端庄清秀，符合小区老太太们的审美标准。

有时我会想起张国荣和那个小姑娘，不知道张国荣在家乡的日子过得怎么样，不知道小姑娘临离开北京前去没去成长城。有时我会问问黄毛大个儿想不想老婆孩子，他所答非所问，只是说现在三个都是男的，没有人会做饭，吃得差多了。

退休以后，我常去国外看孩子，很少到理发店。转眼这么多年过去了，小小的理发店还在，一个理发店能够坚持二十多年，就像长成了一棵树，扎根在小区里，不那么简单。前不久，我去了理发店，原来的铁三角都不在了，没情闹腾了三年，生意不好做，马驹桥的店关了，这家店里，老板亲自披挂上阵，他媳妇给他打下手。我问他那三位元老的情况，他告诉我，张国荣离婚了，黄毛大个儿回家乡开店，他的孩子也大了，在他的店里跟着学手艺。小姑娘的情况，他摇摇头。

老眼惯看往来路，流年暗换往来人。

2023年10月5日写毕于北京



圣埃伦纳峡谷入口 王士跃摄

拐弯的界河

王士跃

正午的日光洒在江湾的陡峭绝壁上，将石灰岩体折射成刺眼的金色墙面，上宽下窄漏斗状逐渐收缩，像一幅舒展开来的非洲地图，底部歪歪扭扭地浸入江心，如金箔长毯直铺到我脚下，一抬腿我好像就能走进辉煌。

我站在美国大弯国家公园(Big Bend National Park)的圣埃伦纳峡谷(Santa Elena Canyon)的入口，美国第四大河格兰德河(Rio Grande)在我脚下拐了大大一个弯，大河南侧为墨西哥，北侧美国，淡绿的河水从中流过。

西班牙人最初踏上这块北美大陆的时候，格兰德河仍旧水源丰沛，如八须鲑鱼在流域摆动。可是今天则大大萎缩，饥瘦得更像是一条蚯蚓在沙漠中抽扭。地球暖化和无数水坝截流工程让大河失去往日的波澜壮阔，只是破裤露膝地光裸着浅滩和卵石，踱着牛步朝墨西哥湾流去。

我伸手触摸水温，凉凉的，水有些浑浊。这里的地质和科罗拉多高原的沙土结构相似，在一亿年间石灰石经激烈切割搓揉，河床陷落为深壑天沟。如果夜泊江上，四周静寂时可以听到沙土在船底窸窣滚动之声。

格兰德河绕了一个弯，又绕了一个弯，拐弯抹角之间，河岸升高了，又沉落了。岸边是茂密的桉柳，牧豆树和扁轴木树丛。扁轴木(palos verdes)也叫绿树，这是美国西南部特殊树种，几乎不长树叶，浑身上下翠绿，像仙人掌一样光合作用就靠着树皮。它也是我们洛杉矶地区某个城市的名字，可那里却偏偏找不到一株这种野生树。土石缝里钻出魔鬼杖仙人掌、无叶花、针刺梨，梨

刺像锥子又尖又长，果肉可食。双花草(Dichanthium annulatum)蔓延两岸，花穗多毛泛红，又叫金胡子，它原本生长于亚非大陆，后侵入美洲，被列为外来植物。一只淡绿的蚂蚱正在花穗上睡觉，忽然嗖地一下就被飞来的墨西哥丛鸦啄走。大约数千种野生动物在此生长，在加州不难见到墨西哥丛鸦、知更鸟、地雀鹀、黑熊、美洲狮等鸟禽山兽，可是在德州沙漠还栖息着灰带王蛇、毒蜥和陆龟这些独特物种。嘘，大家压低了声音，紧急刹车，一只、两只、三只平原土狼(Canis latrans)从车前小碎步跑过，其毛色浅白如野燕麦。

河水流经平原，水面又窄又浅。岸边摆放着许多小商品，式样形形色色。有彩绘的瓶罐、墨西哥挂毯、毡帽、手串和各种绳编小动物等，地上有一张纸写道：“这是我们村里人的手工艺品，你要是喜欢什么就拿去吧，随便给我们留点钱就行。”旁边放着一个钱箱子，用锁头锁着，却不见摊贩人影。

一问才知道，原来是对岸墨西哥人在这设摊贩卖小礼品。墨西哥村庄与我们这里鸡犬相闻，村庄名叫卡门(Boquillas del Carmen)，我能听到一群人在说笑，夹杂着西班牙语。接着看到两只铁皮小船从对岸向这侧划来，另外还有骑马的，扑通扑通跃入河里，水线仅到马肚子而已，伙人渡河而来。

我当时看愣了眼，立即联想到偷渡客、毒枭、墨西哥逃犯的各种传闻，恐怖感也随之袭来。无论这是偷渡还是劫掠，他们在美国作奸犯科后脚底抹油秒窜到墨西哥，美国法律连他们一根汗毛都摸不着！

转眼之间骑马的那人已奔到我们跟前，他从马上跳了下来，三步并作两步地走到商品那里巡视了一遍，又举起钱箱子晃了晃，里面传出当哪当哪的响声。然后他拿出一本揉搓得发皱的笔记本，一本正经地开始在上面记录些什么。

看来我是多虑了，或许是负面新闻听得太多了。他们只是一些不守规矩的小贩子，溜到美国这边赚点游客的钱而已。为了躲避缉查，不得不白天留下货品，傍晚再过河收摊结算。这种自售的地摊后来我们又发现了好几处，走私贩卖的“美墨贸易”在蹚水过河的工夫之间完成。

我试探地问骑马的墨西哥小伙子：“边境巡逻队不会找你们麻烦吗？这可是非法越境啊！”他腼腆地朝我笑了笑，用结结巴巴的英语回答：“不，我们不往前走就没事。”意思说他们只在这里摆个小摊而已，又不是偷渡，大概边检队对此心知肚明，也就睁一眼闭一眼了。

可是既然这么轻而易举就能穿越界河，这里岂不变成了偷渡客的人蛇通道了？

格兰德河这条美墨界河因长年非法移民偷渡，早已变成著名的“偷渡之河”，在枯水期它竟然浅到只要撸起裤腿就能蹚过。然而雨季时河水猛涨，每年都会淹死不少铤而走险的偷渡客。虽说美墨之间界河漫长，特朗普当政时期又发誓加固和延伸高墙，恨不得建造一座美国的钢铁长城，可是非法移民依旧从四面八方不断涌入，高峰时每天竟有数千人过河……

我买了一个塑料编的小仙人掌和特奎拉皮革酒套，离开了格兰德河。夕阳照得卡门高山(Sierra del Carmen Mountains)漫山遍野一片火红，仙人掌像是燃烧的一团一团带刺的火球，从河岸燎原到河那岸去。

同样是对未来的期待，年轻人和老人是不一样的

蒋寅

互文性在时下的文学研究中渐成热词，每见学者在论著中使用，但往往将文学作品的某种相似即古人所谓“相似而非相袭者”(陆深《诗话》)视为互文性，这是不符合互文性概念原义的。互文性指的是文本间的关系，如果不能证明两个文本确实存在影响或模仿关系，那么两者的相似或只是偶然雷同，这不是互文性。互文性取决于写作中意识到其他文本存在而采取的态度。模仿固然产生一种互文关系，规避同样也是一种互文，我曾著文阐述，名之为隐性互文。保罗·麦卡特尼在2000年出版的《披头士选集》中谈到，“约翰·列侬和我一起写了《她爱你》这首歌。当时有一首Bobby Rydell的歌，而且经常听到。当你写另一首歌时，你会想到这一首歌”，他说“我们计划了写一首歌作为回应，我们认为这是一个糟糕的想法，但最终我们在酒店的卧室里，弹着吉他，坐了几个小时，然后写下了《她爱你》这首歌”。这就是互文性的一个例证，他们清楚地感受到Bobby Rydell一首歌的影响，起初想写一首回应的歌，但最终他们否定了这个想法，写出了一首不同的歌。

听古典音乐首先要识乐器，知道各种音响是什么乐器发出的。本杰明·布里顿(Benjamin Britten)为配合英国政府拍摄教育影片《管弦乐队的乐趣》，专门写了一部《青少年管弦乐队指南》(Op.34)，帮助青少年认识乐器的声音。普罗科菲耶夫《彼得与狼》用不同乐器描写动物角色，也有助于儿童认识乐器。近日看墨西哥女指挥阿隆德拉·帕拉指挥拉威尔《波莱罗》的视频，觉得也很适合初哥认识乐器，从定音鼓开始，弦乐、木管

乐、铜管乐、打击乐，轮到什么乐器演奏，镜头就朝向乐手，观众可见识乐器发出的声音。整个视频展示了交响乐队所有的乐器，大可作为教学片。而且这个曲子，随着声响从低到高，每循环一次，就换一种主奏乐器，自然显出不同乐器的声音对比，很适合用于音乐欣赏课。

正因为音乐是最抽象、最难把握的东西，听音乐又是最主观的活动，没有人能绝对自信自己的感觉和判断是唯一正确的，所以更渴望印证和交流。印证是寻求知音，交流是传播自己的感受和判断。但结果往往是出于趣味或自尊，由质疑各自的听音资历和准入门槛，而至于互相诋斥，意气用事，甚或出言不逊，最终不欢而散。不免让人感叹，一种可以提升精神境界、修炼性情涵养的活动，何以会落到这个地步。由此知能心平气和地聆听不同的看法，确是常人难以企及的一种境界，不仅与涵养和格局有关，也关乎交际伦理和逻辑智慧。

三重奏团除了美艺三重奏，大多

同样是

年轻人和老人是不一样的

是顶级音乐家的合作，像海菲茨、鲁宾斯坦、皮亚提戈夫斯基、谢林、肯普夫、傅尼埃、蒂博、科尔托、卡萨尔斯、奥伊斯特拉赫、里赫特、罗斯特罗波维奇、柯岗、吉列尔斯、罗斯特罗波维奇、克莱默、阿格里奇、麦斯基、郑京和、普列文、托特里、杜梅、皮尔斯、王健，历史上最有名的小提琴家、大提琴家和钢琴家大概都和当时最杰出的艺术家结过三重奏团，但四重奏团却正相反，历史上著名的四重奏团很难数出一流的演奏家，甚至独奏艺术家。我只知道罗马贝多芬四重奏的创始人菲利普斯·阿约勉强算一个。虽然巴利利四重奏团的第一小提琴家巴利利发行过莫扎特小提琴奏鸣曲唱片，苏斯克四重奏和格罗德豪斯四重奏的第一小提琴苏斯克也发行过贝多芬小提琴协奏曲唱片，但恐怕没有人会把他俩视为一流小提琴家，现在知道他们的估计也不多了。原因可能在于三重奏音乐中，每种乐器都有很强的独立性，各自突出，互相竞争，而四重奏曲则以第一小提琴为主导，其他乐器处于陪衬地位。一个最损的对四重奏团的描述

是一个拉得不太好的小提琴，一个拉得更不好的小提琴，加一个拉不了小提琴转行的中提琴，再加一个两种乐器都不能学的大提琴。

经常看到知识界为民众不善于思考而悲哀。其实民众不是不会思考——微信上议论国是，评论国际问题，似乎都是经过思考的。问题是许多人用来思考的知识全是错的，既不懂世界，也不明国情，以致一思考就错。

一篇论文人人都赞同，一定不会是价值很高的论文。论文的观点能被所有人接受，只意味着它说出了一个人所周知的共识。真正富有创见、有很高价值的论文，大概会是三分之一的人赞同，三分之一的人反对，三分之一的人看不懂。反对的和看不懂经常相交叉，因此真正有创见的论文遭否定的概率更高。

叶芝《致凯瑟琳·泰嫩》写道：“在《奥依辛》的第二章，我模拟象征主义的风格，写了一些也许只有自己才能明白的诗句。我奉献给读者的浪漫。读者

「文汇报」 微信公众号 二维码